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卷

鹿天佑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卷

庞天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卷/庞天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07-3

I. ①中… II. ①庞…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史学
思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894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WEIJIN NANBEICHAO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庞天佑

责任编辑: 陈稚瑶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07-3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学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上承两汉三国，开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思想史的发展不一定是直线式，也不完全是一个模式的发展。它既可以是内涵的发展，也可以是外延的扩展，或者二者兼有之。也还可以是两者都有一定的新的变化，但在史学思想高度上，却是没有大的突破，呈现出横广式发展的特征。^{〔1〕} 中外思想史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魏晋史学与两汉史学相比，就是横广式的发展。总体上看，这一个时期没有马、班这样站在时代高峰上的史学大家，没有《史》《汉》这样的大著作。但不是说，这一阶段没有新进展。史书增多了，这既包括数

〔1〕 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出《中国史学史教本》，对魏晋南北朝史学有详细论说；80年代，他分阶段论说这时期的史学，并做了概括，说：“综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从史家个人的成就说，很难说哪一个人能全面地超过马、班。但从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比秦汉时期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刘节先生也说：“魏晋南北朝到隋，是中国史学界一个发展的时代。史家与史籍也是风起云涌，盛极一时！”“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淘汰之后，真正可以流传不朽的著作，却又不多了。同时，史家中可以与司马迁相比的人物又是没有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71页）

量方面也包括种类方面。^[1]除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外，还有注释书、起居注、氏族谱、地理书、人物传、笔记之类作品，在史学上都是很有成绩的。^[2]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它是文论著作，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史论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史传》篇。^[3]它成为唐朝刘知幾史论之作《史通》的先声。

在历史文献学上，在学术门类上，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地从经、子门类中分离出来，蔚为中国学术之大宗。“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显然是经史分离，而史书以附庸成为大国了。”^[4]注意，这里是从学科专门分类上说的，而不是说史学发展不再受经学影响，特别是史学思想。

如果说，两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高峰，形成传统史学民族性的基本特征，那么，魏晋南北朝史学则是在许多方面推进中国史学，为传统史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

在史学思想上，不同的魏晋史学潮流在儒玄以及释道的碰撞中，开始了最初的交融，^[5]到了这个时期的后期，出现儒玄合流的趋向。

有必要就玄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多说几句。玄学的影响，除了以玄

[1]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数量各家说法不一。白寿彝先生统计，纪传体著述有后汉史10种、三国史7种、晋史11种、南北朝史17种，编年史方面有后汉史4种、三国史2种、晋史11种、南北朝史6种。“这些书绝大多数，是以当代之人记当代之事。”从种类上说，注释书增多。自晋泰始以后，历朝多有起居注，并形成记注制度，氏族谱和人物志的撰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有很大数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1—912页）。

[2] 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把《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作为东汉以下到隋代史学上的重要作品。其中，《世说新语》“不只是材料，我们要由此了解这一个时代的精神”。

[3] 汪荣祖的《史传说》（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是专门研究《文心雕龙·史传》的著作，论说其史学意义，进而做中西史学比较。钱锺书的《序》中说：“斯所以一朝之史、一人之传，祖构继作，彼此相因相革而未有艾也。刘彦和《史传》一篇稍窥端倪，刘子玄《史通》穷源（原）竟委，慎思明辨，卓尔成一家言，后来论者，只如余闰。”

[4]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5] 逯耀东认为：“儒家与非儒家价值体系同时并存在这个时代之中，形成魏晋史学双层性的发展。”（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0页）

理解史以外，还有一些新的认识可以提出来。一是玄学阻滞了史学向着儒教化方向变动。二是玄学对天人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自然”通变观方面。“无为”，一方面是讲自然之道是必然之道，不是人可以改变的；另一方面是突出了人的“自然”个性，所以以纪传体为代表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纂方法，变化为突出人的“个性”的史书编纂旨趣。毫不奇怪的是，列传变化为人物专传、别传，史论突出了对历史人物的风采、风度、才情、才性的评述。三是，玄学的思辨为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但是由于玄学发展到后期，没有融汇其他学术，包括没有能吸纳释道之学，成为新的文化因素，形成新的思维，最终，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儒玄“合流”，不能形成新思潮。一方面是主要以儒学观点进行经学、史学的总结，另一方面是佛学、道学的继续存在与变化，从而使接踵而来的隋唐的史学思想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两汉以来史学展示出的大势是：从汉初各家林立、合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到董仲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汉代学术的神学化，再到经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出现新的学术汇合的趋向。^[2]而儒释道学术上的大吸收与融化，产生新学术，进而导致经学、史学的大变化，则是隋唐以后的事了。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时，我们应当总结周一良先生的贡献。

顾颉刚先生早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说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便指出：“周一良先生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贡献之多，仅次于陈寅恪先生。”如论文《北魏镇戍制度考》（《禹贡》三卷九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和《论宇文周之种族》（同前）等。

应该说，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成就，包含有他对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1935年他在《燕京学报》第18期上发表的《魏收

[1] 冯友兰说过，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的发展”，也就是更强调先天的感悟。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第37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白寿彝《史学史教本初稿》第2篇第3章（《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逯耀东《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

[2] 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之史学》，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南北朝史学研究的论文。

周先生治学面相当开阔，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其间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1] 20世纪80年代，他的研究重点又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史与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上，把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

1.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
2. 《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1985年12月改订完）（札记式）；
3.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4. 《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此外，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论佛典翻译文学》也是涉及南北朝史学的重要文章，以上论文收进《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2]（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这里，就周先生的论著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方面提出几点。

——以深义文化的观点来解读南北朝史学，揭示经学和史学的关联。他注意南北经学差异，进而讨论经学对史学的影响。皮锡瑞说，南北朝分立，“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皮氏认为“北学反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

[1] 新中国成立前，周一良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是魏晋南北朝史。之后，治史重点转移到中外关系史、世界史、亚洲史上面。“文化大革命”后，一方面是亚洲史、中外关系史的宏观考察，组织学者写出有分量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另一方面是整理和加深对南北朝史和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参见吴怀祺：《追寻深义文化的底蕴——访周一良教授》，《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23—29页。

[2] 先后出版的相关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上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也”^[1]。周一良则认为，和南方社会比较，“北方虽然保留了汉魏社会遗风，但经济上的落后不免导致文化上的保守”。但他不是讨论经学，而是讨论南北经学不同对史学学风的影响。他引用并分析了几段材料：

1. 《世语新说·文学篇二十五》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的注说：“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周先生认为，褚孙对话时南渡才三十几年，所谓北人南人，主要恐怕还不是指十六国的北方与东晋，而是指魏晋以来的趋势，是为时已久的区别了。到南北朝对立时，这样的区别继续存在。

2. 《隋书·儒林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3. 《北史·儒林传》也引这几句话，说明这是唐人公认的结论。就是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刘师培有《南北经学不同论》一文，但忽略了玄学与佛学对所谓新理论的推动促进作用。周一良先生说：“我想用《论语》的话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方偏于思而不学。褚孙对话与《隋书》《北史》的议论，都有助于探求南北史学不同之处。”^[2]这是一个新解。

下面是他具体分析南北经学影响到史学的事实。

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体裁不一，但范、沈之书的序和论确实体现出“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曄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今存萧子显《南齐书》，也可以窥见南朝历史著作中善于议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182页。

[2] 周一良：《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页。

论的倾向。总而言之，从范晔、沈约、萧子显三家著作中看得出南朝学风总倾向在史学上的表现，形成南朝史学不同于北朝史学的一大特点。

再看魏收《魏书》列传的序或论。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论事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其议论标准固是儒家伦理道德，而对拓跋氏一朝政治上兴衰得失，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也没有指出哪些发展变化，更没有宏观地把北魏王朝与以前时代联系起来考虑观察。议论思辨性不强，因而也不能像南朝史家某些议论之较为深入。这样就“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给人以识暗之感，较之南朝史学大有逊色了”^[1]。

上面摘引的内容，有些还可以讨论，比如南北史学差异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反映等。但先生这样解读魏晋南北朝史学，是深层次的讨论了。

特别要提出的是，把史学与他的文化史观点联系起来，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说：

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两种不同倾向，与学术和文艺分野内的异同，似乎也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2]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3]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周一良先生是把文化史的创获与史学史联系

[1]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11页。

[2] 关于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深义文化的文化三个层次的观点，可参看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

[3]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12—313页。

在一起，他关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丰富了对史学史的看法，而对史学史的研究又佐证了他的文化史认识。

——关于正统与禅代的论说，具体揭示了南北朝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这里可以摘录他的几段话：

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牵涉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1]

在弥缝粉饰“篡弑”问题上，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了两种办法。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随着以禅代方式夺取政权愈益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后，这两种手法中，前者已无必要，后者则由隐讳曲笔变成公开宣扬禅代为合理合法了。^[2]

东晋的袁山松、范晔《后汉书》对汉朝灭亡、曹魏的出现，评价不一。在写晋史问题上，西晋武帝时，曾把历史断限问题交给大臣们讨论。荀勖、王瓚、王戎、陆机（《晋书限断议》），孙盛（《晋阳秋》），王隐、虞预、臧荣绪、干宝（《晋纪》）等，各有各的意见。这些意见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后代写晋史，如何法盛《晋中兴书》，刘谦之、王韶之、徐广、裴松之的《晋纪》等书，同样是有各自目的，而沈约《宋书》则是“公然歌颂刘裕代晋是众所乐推”。

——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除在修史制度上，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史学继承先秦以来太史公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

[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25页。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15页。



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1]

——说明史学与宗教的关系。周一良先生在论说这一时期的史学特点时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之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2]《魏书·释老志》是一个创举。齐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不少僧人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

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3]

——展示中外史学比较的途径。这里可以提出三点。首先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途径比较。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春秋》、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前59—公元17）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1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

[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75页。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6页。

[3]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7页。

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1]

二是，中国与印度思维比较。中华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样，自古以来耽于玄想，长于思辨，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道德伦理之学和历史之学特别发达，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著述特别丰富。早在商代，已有问卜以后在龟甲兽骨上刻辞做记录的习惯。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这一点对于历代注重记录旧事，力避数典忘祖亦不无影响。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2]

三是，中国与日本史学比较。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8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做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是综合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成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这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外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的《汉纪》、袁宏的《后汉纪》和孙盛的《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3]

比较中外史学发展途径的相同和不同方面，努力吸收中外史学之长，不只是注意西方史学的进展，也注意总结东方史学的特点，这是开阔的历史眼光。我们要发展新世纪的史学，也必须做好这项工作。

记得，1988年4月19日，先师白寿彝先生亲自带我去访问周一良先生，同行者还有刘雪英同志。学校派了车送我们去北京大学燕东园。整整一个上午，周先生富有哲理的谈话，极有条理，给我的印象很深。两位一代史学大师相知相通，他们亲切的交谈，又是在给我教诲，使我终

[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0页。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74—275页。

[3]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81页。

生难忘。后来我写成访谈录《追寻深义文化的底蕴——访周一良教授》，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上。此后，周先生每有新书，总是要人带给我一本，我从内心感激，也因此能较为系统地学习周先生的著作。这里着重写出我读周先生书的心得，一则是周先生的书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很重要；二是，相对地说，我读周先生的书较多，因此，感受当然也多一些。

多年过去了，两位大师也先后辞世。今生请益何去处？泣东风，泪千行。

本卷著者庞天佑教授在博士生学习阶段，师从南北朝史研究专家高敏先生，这为他的史学进展奠定了基础。庞天佑在两汉历史哲学、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上，多有创获。本卷全面展示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发展大势。第一编写思潮，第二编写几位大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经纬交织，是宏观的纵览也是微观的解剖。他根据自己研究的实际成果，也写了宗教与史学的关系。总的来说，本卷写出一个大时代史学思潮的涌动，甚矣哉，史才之难也。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佛教与儒家思想 / 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大势与历史地位 / 4

第 一 编

第一章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思想 / 13

第一节 门阀士族的统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变化 / 13

第二节 从史书内容看门阀士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思想的影响 / 18

第三节 从史著体例看门阀士族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思想的影响 / 21

第四节 门阀士族的统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局限性 / 25

第二章 民族关系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思想 / 2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总的特点：在冲突与对立的过程中走向融合 / 29

第二节 民族史撰著与民族平等的史学思想 / 3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与史学 / 37